

共和传统与 19 世纪末的美国工人运动

——为什么恩格斯晚年的期望未能实现^{*}

蒋 锐 高建明

[内容提要] 在恩格斯晚年,美国工人运动出现过一次高潮。恩格斯认为,这是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的有利时机。他期望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抓住时机,将美国工人运动引向社会主义。然而,从之后的情况看,恩格斯的期望并未实现。对此已有三种比较著名的解释:“烤牛肉和苹果派”论、自由土地论和“投票权馈赠”论。但这些解释都不适用于 19 世纪末美国的特殊情况。在指出已有解释的不足后,本文尝试从美国共和传统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释。

[关键词] 共和传统 社会主义工人党 亨利·乔治 劳工骑士会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5)05-0179-07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5.05.026

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人运动日趋高涨。1866 年,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全国劳工同盟”成立。1877 年,约有 8 万铁路工人和 50 万其他行业工人参加的铁路大罢工爆发。1886 年,亨利·乔治在统一劳工党的支持下竞选纽约市长,得票 6.8 万张。与此同时,劳工骑士会也进入鼎盛时期,会员总数多达 70 万人。恩格斯认为,这是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的有利时机。他期望美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团结亨利·乔治和劳工骑士会,把美国工人运动引向社会主义。^①然而,从之后的情况看,恩格斯的期望落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与亨利·乔治以及劳工骑士会有过合

作,但都以失败告终。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未能实现恩格斯的期望,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阻碍着社会主义在美国工人中的传播?

一、已有解释的不足之处

对此问题已有三种比较著名的解释,这些解释貌似合理,但如果将其放在 19 世纪末美国的特殊环境下考察或者以比较的眼光视之,其不足之处便会显露出来。

第一是“烤牛肉与苹果派”论。桑巴特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工人的货币工资是德国工人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3&ZD008)的阶段性成果。

二至三倍,两国工人在吃、穿、住方面的花费差不多。但两者还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德国工人将剩余的钱更多地用于购买酒精饮料,而美国工人则用剩余的钱进一步改善自己的衣食和住房。因此,综合来看,美国工人比德国工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也住得更好。桑巴特在最后总结道“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面,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②对于桑巴特的这一论断,已有学者从各个层面进行了反驳。例如,桑巴特忽视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和英德两国存在的二次分配情况以及物质生活水平与激进倾向不具有必然联系等。即便如桑巴特所言,美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好于欧洲工人,这也仅是横向的对比。从纵向来看,内战后美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不如内战前。一名英国工人曾在著作中回忆道“内战开始前,制帽业中勤俭且适当节约的工人只要有2/3的时间在工作,就可积蓄钱财,同时,只要一周赚6美元就可供养一个中等规模的家庭。这样的时光,在美国,就像做过的梦一样,已经流逝了,并且恐怕再也回不来了。”^③这位英国工人的说法得到了印证,一名印刷工妻子在1864年开出的家庭消费品清单可作证明。她谈到拥有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只有在每周消费了以下物品后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一袋面粉,1.40美元;每天少量的马铃薯需花费13美分,一周共0.91美元;1/4磅的茶,0.32美元;一磅咖啡,0.35美元;3.5磅糖,0.80美元;每周所需的肉,3.00美元;两蒲式耳碳,1.20美元;四磅黄油,1.6美元;两磅猪油,0.38美元;灯油,0.20美元;肥皂、淀粉、胡椒粉、盐、醋等,0.75美元;蔬菜,0.05美元;苹果干(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0.25美元;杂货,0.44美元;租费,4.00美元;合计:6.00美元。鉴于此,她给英国工人的建议是:如果在英国每周能赚到25到30先令,那么还是留在当地为好。^④

第二是自由土地论。早期德国移民赫尔曼·克里格、边疆学派代表弗里德里希·特纳以及桑巴特都认为自由土地能缓解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敌对情绪“只是认识到自己可以随时成为一个自由的农场主,就可以使美国工人感到安全和满意,这是一种不为欧洲工人所知的状态。一个人,如果他生活在被迫逃离时有能力逃离的幻想之中,那么他就更容易忍受压迫性的环境。”^⑤然而,仔细

考虑,此种解释并不适用于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其一,如果自由土地能起到“安全阀”作用,那么劳资双方就不会爆发频繁且激烈的冲突,甚至到流血的程度,就像1877年铁路大罢工所显示的那样。其二,19世纪后半叶,美国农民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如格兰其运动、绿背纸币运动、人民党运动等。这说明美国农民的处境也很艰难。即便工人能够如愿获得土地,成为农场主,他们一样会起来反抗。

第三是“投票权馈赠”论。塞利格·伯尔曼在考察了美、德、英、俄四国的工人运动后得出结论:投票权能抑制工人的激进倾向。“在其他国家,劳工运动开展的时候,工人还没有获得选举权,结果是不需要剩余价值理论就可使他们确信自己被当作做一个特殊的阶级来对待并且应该有‘阶级意识’与之相反,美国工人早就获得了作为杰克逊民主运动副产品的投票权。”^⑥李普塞特对此作了反驳,他指出澳大利亚和瑞士存在相反的情况。瑞士成年男子早在1848年就获得了选举权,但这不仅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兴起。同样,澳大利亚成年男子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选举权,澳大利亚工党也是借助工人的投票权兴起的。^⑦

既然以上三种解释都不能成立而社会主义工人党未能借机兴起又是事实,那就说明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下文尝试从美国共和传统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释。

二、共和传统对美国工人的影响

总体而言,社会运动的发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运动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和存在运动主体能用以表达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生活水平的降低为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第一个条件,共和传统则为其提供了第二个条件。共和传统推崇的政治状态是各个阶层的公民相对独立地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惟其如此,公民才能展现其“美德”,或曰“男性气概”。如果某一阶层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就被称之为“腐败”。大致平等地分配财产被认为是保障公民独立的前提,而财产的积聚必然导致公民美德的丧失和共和精神的衰落。“美德”、“男性气概”、“独立”、“腐败”等构成了共和传统的核心语汇。

(一) 共和传统影响下的利益表达逻辑

美国工人的利益诉求由逻辑连贯的三部分组成,从中可以看出共和传统对美国工人的深刻影响。

第一,强调“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损害了公民的“男性气概”、“美德”和“独立”。1864年,《芬奇工会评论》刊登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工会组织的一封信。其中,路易斯维尔市工会组织号召反对“实物工资制”,原因是它“有损男性气概,有悖公民的尊严和权利,充满不义与压迫,而且经验证明它是一种用来剥夺大地之子应得报酬的手段”^⑧。1866年,《工人辩护者报》编辑安德鲁·卡梅伦为全国劳工大会起草了《全国劳工大会告合众国工人书》。大会是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召开的,理由是过长的劳工时间使得工人没有闲暇培养“美德”、发展才智。卡梅伦将工人称为“同胞公民”,强调“共和制的成功仰赖工人阶级的美德、才智和独立”是不言自明的,“所有让公众陷入无知的政治或社会制度,不管是经由不公正的、压迫性的法律还是经由过度的劳动,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的利益损害都是相同的”^⑨。1867年,全国劳工同盟在其《纲领和政治行动决议》中提到:工人联合起来是为了保卫他们的权利,肆无忌惮的银行家和高利贷者通过“愚蠢腐败的立法”损害了工人的这些权利^⑩,民众的冷漠也给垄断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用津贴来贿赂立法机构,使立法机构陷入“腐败”^⑪。1869年9月2日的《工人前进报》刊登了工人改革党的纲领。该纲领呼吁工人要时刻警惕自由的丧失,要揭穿投机者和银行家“腐败的政治图谋”,使好政府所需的权利平等和正义得到恢复。^⑫

第二,强调工人组织无意激发阶级仇恨,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引导工人罢工。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损害了公民的“男性气概”、“美德”和“独立”,那么工人就有必要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考虑到罢工是阶级斗争的体现,所以美国工人组织将罢工作为最后的手段。北美国际工业联合会的章程提到“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支持工人罢工”^⑬。《全国劳工大会告合众国工人书》也宣称:工会的目的被人误解了,“绝不是鼓励工人对雇主的敌对精神”,所有组织得当的工会都承认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利益上的一致

性。^⑭如果罢工不可取,那么工人应该采取何种手段呢?全国劳工大会倡导的方式是在可行的地方任命一个委员会,由其向雇主陈述工人遭受的苦难,期望工人能得到雇主的救济。^⑮

第三,强调工人组织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雇主和工人的合作,使二者和平共存于一个共同体。美国工人认为,只有当雇主和工人恢复合作时,他们珍视的“男性气概”、“美德”和“独立”才能得以恢复。北美国际工业联合会的目标是“竭尽全力用光荣的手段调解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争议”,努力制定出“既对雇主又对工人有利的行动方案”。^⑯《全国劳工大会告合众国工人书》也提到“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合作关系”,工人组织的目的是恢复这种合作关系。^⑰全国劳工同盟芝加哥大会的政治决议也指出:恢复工人权利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是建立一种“使资本和劳动能够真正实现合作的制度”^⑱。这些工会组织认为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合作“对整个共同体都有益”^⑲。

可见,美国工人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带来的压迫,但他们仍然认为雇主和工人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他们不主张阶级斗争,其最终目的也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实现阶级之间的合作。

(二) 共和传统对亨利·乔治的影响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中特别提到了亨利·乔治竞选运动和劳工骑士会。亨利·乔治竞选纽约市长运动集中于1886—1887年,劳工骑士会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壮大的,二者如80年代之前的工人运动一样也深受共和传统的影响。

亨利·乔治观察到,地租上涨的时候,工资和利息会下降;相应地,地租下降的时候,工资和利息会上涨。他认为,是地租在吞食工资和利息,因此土地垄断才是导致贫穷的罪魁祸首。“演绎和归纳都使我们达到同一真理——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必然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平等。”^②贫富分化不可取的原因不在于贫困本身,而在于它使人民变质堕落并对共和政体形成了威胁。“腐化司空见惯,热心公益的沦丧,重名誉、重德行、重爱国心的传统削弱……共和主义,原来曾确信是国民幸福之源泉的,现在已不再有这种信念了。勤于思考的人开始注意到它的危险,但还不知道如何克服

这些危险;开始接受麦考利的见解、怀疑杰斐逊的见解了。有腐化且日益严重的现象,人民也普遍习以为常了……就是说,人民自己也变质堕落了。”^②亨利·乔治开出的药方是土地公有。“从事物的本质来看,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承认土地为私人财产密不可分,结论必然是:纠正财富分配不公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土地的公有。”^③亨利·乔治意识到土地公有的主张过于激进,于是改提单一税纲领,即废除其他租税,仅仅征收地价税。亨利·乔治是想通过征收地价税来消除贫富分化,挽救共和主义。

《进步与贫困》为亨利·乔治赢得了巨大声誉,马克思曾称赞他为“天才式的作家”,许多国家的土地改革团体也曾邀请他去演说。正是基于亨利·乔治的广泛影响和对其主张的认可,统一劳工党才提名他为1886年的纽约市长候选人。

(三) 共和传统对劳工骑士会的影响

19世纪80年代,最为成功的工会组织当属劳工骑士会。劳工骑士会由尤利亚·史蒂芬斯于1869年12月在费城组建,它主张不分肤色、国籍、民族、性别、宗教信仰、党派归属、行业上的差异团结一切工人。1878年之前,劳工骑士会发展缓慢,原因是它采用秘密行动的原则。例如,成员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留在街道上的神秘符号进行的。1879年9月,主张秘密行动的史蒂芬斯辞去总会长的职务后,劳工骑士会抛弃了以往的原则,成为公开活动的组织。1881年后,劳工骑士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于1886年达到顶峰。

共和传统对劳工骑士会的影响可从劳工骑士会的入会仪式和当时舆论对它的评价中看出。新成员加入劳工骑士会时有一套繁杂的入会仪式,在仪式的最后,劳工骑士会的总会长除要向新成员说明采取秘密原则的原因外,还要陈述以下内容“我们无意与合法的企业起冲突,也无意反对必需的资本;我们针对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利令智昏,忽视其他人的利益,看到羸弱无助的人时,他们甚至侵犯这些人的权利……我们要尽全力支持为协调资本和劳动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我们不允许大罢工,但是,当对抗压迫者成为正当的需求时,我们会保护和援助我们遭受损失的成员。”^④1875年3月13日的《全国工人保卫者报》提到过劳工骑士会“我们听闻它即将扩展到匹

兹堡。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热诚地欢迎它。在其中,所有行业的工人,各种各样的见解和信仰汇聚到一起,为共同的目的采用共同的纲领。在其中,所有人都返回到共和政府最初的原则和理念,这些原则和理念纯粹简单,由汉密尔顿、华盛顿、亚当斯以及所有其他殖民地爱国人士传给我们。”^⑤鲍德利的传记作者克雷格·费伦也认为,劳工骑士会之所以能赢得广泛支持在于其领袖对共和传统的阐释“除非受到抑制,否则资本的集中将很快使共和国的前景变得暗淡,美国不再是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公民活力的光荣代表,它已成为这样的土地,在其上,堕落和贫穷的大众被一小撮经济精英统治着。”^⑥

三、美国工人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拒斥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中把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工人运动分为三类:亨利·乔治领导下的统一劳工党、劳工骑士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但如果从三者的意识形态归属来看,实际上可分为两种。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由德国移民组成,它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主张阶级斗争。亨利·乔治和劳工骑士会接受的是共和传统,二者反对阶级斗争,希望恢复阶级间的合作。正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恩格斯的期望未能实现。

(一)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阶级斗争主张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北美联合会、伊利诺斯州工人党、辛辛那提社会政治劳工协会于1876年合并而成的。成立之初的名称为美国工人党,1877年更名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四个组织中,北美联合会和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人数最多,分别有1500人和635人。他们都是由1848年革命后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发起成立的组织,美国社会把这些德国移民统称为“四八分子”。北美联合会起源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左尔格等组建的共产国际美国支部,是马克思派控制的组织;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则是由拉萨尔派控制的组织。因此,一开始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就存在着马克思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派控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时间是1876年以及1887年之后,拉萨尔派控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时间是1877—1886年。虽然两派在

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上存在分歧,但都不同程度地主张阶级斗争。

1876年美国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美国工人党原则宣言》主要体现了马克思派的主张,其中提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独立于一切有产阶级的政党”,“为解放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我们要求一切劳动资料(土地、机械、铁路、电报和运河等)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财产”。^②马克思派在1889年的代表大会上重新控制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889年纲领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抨击了私有制后,它号召消灭阶级,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我们号召美国雇佣劳动者和其他一切诚实的公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下组成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团体,这个团体知道它的权利并决心用取得公共权力的方法来获得这些权利;所以只要在当前阶级斗争最困难的状况下以不屈不挠的团结一致的精神联合起来,我们就能消灭阶级,把土地、一切生产资料、运输工具和分配手段交还给作为集体的人民,并以合作共和国代替目前的无计划生产、工业战争和社会混乱的状态,从而迅速结束这个残忍的斗争。”^③

拉萨尔派制定的纲领虽然没有马克思派那么激进,但也有对阶级斗争的说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1877年纲领提到,“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工人的物质条件都是相同的,并且是由同样的原因导致的;为工业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是国际性的,自然应当是合作的和互助的”^④。其1885年纲领提到,“通过逐渐消灭中产阶级,这一体制必然使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由工资工人组成的阶级和由大老板组成的阶级”^⑤。其1887年纲领提到,“这一体制演化到最后阶段,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大众将最终与人数相对较少的工业暴君对抗,考虑到生活状况的不确定令人难以忍受,前者将被迫取消工资制度,建立起合作的社会”^⑥。

(二) 社会主义工人党与亨利·乔治的合作及其失败

亨利·乔治是凭其单一税纲领参加纽约的秋季选举的。与亨利·乔治进行竞争的是民主党人艾布拉姆·休伊特和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后成

为美国总统)。在竞选过程中,休伊特曾指责亨利·乔治在挑拨阶级之间的斗争。亨利·乔治在给休伊特的公开信中反驳道“你听了太多关于无产阶级的事情,但你却明显忘记了所谓的‘工人阶级’不是指一个阶级,而是指大众,他们所参与的任何政治运动也不能算作一个阶级在反对其他的阶级,而是如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赞扬的,它是‘大众反对阶级’的运动……作为参选人我不只代表手工劳动者,以这个时代能够给予美国公民的最民主的方式我得到提名,但提名我的人不全是手工劳动者,而是各种各样的工人——编辑、记者、教师、牧师、艺术家、作家、医生、店员、商人——简言之,通过体力和脑力谋生的所有阶层的代表。”^⑦

亨利·乔治实际上是在否定其竞选运动的阶级性质,这基于他对“工人阶级”的宽泛解释。从事脑力劳动的广大中产阶级也被他囊括进“工人阶级”,只有垄断巨头是例外。可见,亨利·乔治对“工人阶级”的理解不同于社会主义工人党,他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大众,所以二者的决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886年的竞选结果是:休伊特得票9万张,亨利·乔治得票6.8万张,罗斯福得票6万张。亨利·乔治把落选的原因归结为休伊特的指责吓跑了一部分中产阶级,所以他决定撇清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关系。1887年6月,他在《旗帜报》上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不满,说它“只有狭隘的含义,会破坏新的运动,使人认为这一运动只是一种阶级运动”。在此后的8月13日的《旗帜报》上,亨利·乔治又说道,“那些认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不是土地税而是‘废除一切生产资料私有财产’的人,在统一劳工党内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国家社会主义及其使一切资本成为国家的公有财产的观念……是外来的,是在欧洲条件下产生的,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繁殖”。同样是在这份报纸上,亨利·乔治公开宣称,为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就必须排斥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人绝不会支持容纳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独立政治运动”^⑧。在亨利·乔治的影响下,统一劳工党县总务委员会宣布: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没有资格作统一劳工党的党员。随后,1887年8月17日召开的统一劳工党州代表大会取消

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五名代表的代表资格。社会主义工人党与亨利·乔治从此决裂。

(三) 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劳工骑士会的合作及其失败

社会主义工人党也与劳工骑士会有过密切的合作。劳工骑士会的总会长鲍得利曾加入过社会主义工人党。鲍得利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在人类社会关系上提倡一种比目前盛行的制度安排更为明确、有序和和谐的制度安排”。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劳工骑士会都在为“更为平等的政府形式”、为“使世界变得更好”而奋斗。尽管如此,鲍得利还是担心自己被混同为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看到公众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恐惧感。他认为尽管这种恐惧感是出于无知,但作为劳工组织的首领最好还是不要触犯众怒。他给出的建议是在宣传社会主义的原则时不要使用“社会主义”一词。^③

可见,一开始劳工骑士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片面的,这为劳工骑士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如果说拉萨尔派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还能令劳工骑士会产生幻想,那么1887年后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则使这一幻想最终破灭。1893年,索夫林取代鲍得利成为劳工骑士会的总会长。索夫林能够当选得益于以德里昂为首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支持,德里昂开出的条件是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担任劳工骑士会机关刊物的编辑,但索夫林没有履行承诺。在其操纵下,1895年劳工骑士会全国大会以23票对21票取消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的资格。德里昂带领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退出了劳工骑士会。索夫林在1894年5月10日的《劳工骑士会报》上号召会员不要把“不承认人民具有控制和发行货币或美国的交换媒介的人选进国会”^④。可见,劳工骑士会是主张改良的,他们提倡的是“明确、有序和妥协的制度安排”,这体现了共和传统的精髓,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倡导的阶级斗争原则相去甚远。

四、结论与思考

恩格斯在提出期望的同时,也指出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应采取的策略。首先要暂时放下理论上的分歧,打入美国工人内部。在1886年12

月28日写给威什涅维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说道“运动应当扩大,协调地进展,生根,并且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的美国无产阶级,这比运动一开始就根据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前进和发展重要得多”,“现在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十一月间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比十来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完善的纲领要重要得多”。然后,通过工人运动遭受的挫折向美国工人证明原来纲领的错误性和社会主义纲领的正确性,也就是所谓的“从里面使它革命化”。“实事求是地来考虑运动的实际的出发点,把它逐渐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指出每次所犯的 error、每次遭受的失败,都是原来纲领的错误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恩格斯相信,只要遵循这样的策略,即便亨利·乔治和鲍得利从中阻挠也无济于事。“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正确的方向,谁要是从中阻挠,不论是亨利·乔治或是鲍得利,就会跟他们自己的一小群人一起被大家唾弃。”^⑤由此可见,虽然恩格斯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人的团结优先于理论的正确,但理论的正确并非无关紧要,而是要在工人运动的开展过程中证明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也就是把美国工人引向阶级斗争的理论。恩格斯之所以寄希望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是因为“这个党起源于外国,那末,它同时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并且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这种理解远远超过了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⑥。

恩格斯之所以认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能打入美国工人内部,基于他对美国工人特性的一种判断:美国工人“注重实际而又轻视理论”^⑦。这意味着为谋求利益或赢得选举,他们不会排斥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一个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政党合作。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恩格斯只看到了美国工人特性的一面。塞缪尔·亨廷顿在《失衡的承诺》一书中指出“存在着两种美国政治:一种是运动和事业的政治,信念激情和改革的政治;一种是利益和集团的政治,实用主义协商和妥协的政治。”^⑧如果美国工人只讲求协商和妥协,那么恩格斯设想的策略自然没有问题。但美国工人中还存在着“信念激情和改革的政治”,具体到19世纪末来说,就是为他们的利益诉求提供正当性

的共和传统。不同的利益可以妥协,不同乃至相反的信念或意识形态却难以相容。当外在条件没有激发意识形态冲突时,基于利益的合作或许可以实现,但当情况相反时,意识形态的阻碍作用就会突显出来。正如上文所表明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尝试过与亨利·乔治、劳工骑士会进行合作。但当休伊特指责亨利·乔治在挑拨阶级斗争时,他就急切地切断了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所有联系。劳工骑士会亦是如此,索夫林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当上了总会长,但当社会主义工人党企图掌控劳工骑士会的机关报时,考虑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阶级斗争主张,索夫林也选择了不再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合作。

注释:

①③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91页,第389—390页。

②⑤ [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第181页。

③④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John. R. Commons and John B. Andrews, (eds.), *Labor Movement, 1860—1880 (Volume IX)*,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 1910, p. 60, p. 67, p. 122, p. 145, p. 177, p. 189, p. 234, p. 124, p. 152, p. 155, p. 124, p. 151, p. 179, p. 248.

⑥ Selig Perlman, *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Lithographing Corporation, 1928, p. 167.

⑦ Seymour Martin Lipset &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0, pp. 58—60.

②①② [美]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5页,第476页,第295页。

②④ John. R. Commons and John B. Andrews, (eds.), *Labor Movement, 1860—1880 (Volume X)*,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 1910, p. 24, p. 34.

⑤③ Craig Phelan, *Grand Master Workman: Terence Powderly and the Knights of Labor*,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p. 2, pp. 66—67.

⑥②③④ 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第223—224页,第273页。

⑦ [美]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0页。

⑧ *National Platform of the Socialistic Labor Party of North America, 1877*, see from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usa/parties/slp/1877/plat1877.pdf>, 2014. 12. 28.

⑨ *National Platform of the Socialistic Labor Party of North America, 1885*, see from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usa/parties/slp/1885/1008-slp-platform.pdf>, 2014. 12. 28.

⑩ *National Platform of the 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North America, 1887*, see from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usa/parties/slp/1887/plat1887.pdf>, 2014. 12. 28.

⑪ Commons,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I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6, p. 452.

⑫⑬《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197页,第196页。

⑭ [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责任编辑:文心]